

# 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古藏文刻经与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交融<sup>①</sup>

张长虹

---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藏昌都和青海玉树地区都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佛教石刻,既有造像又有刻经。文章梳理出其主要刻经内容有:《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无量寿宗要经》《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通过对汉、藏文大藏经和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同名佛经的整理分析,发现这些佛经均有藏、汉译本,不仅保存在汉、藏文大藏经中,在敦煌文献中也均有发现,是在吐蕃时期就已经译出并且非常流行的经典。根据同出的古藏文纪年题记信息,西藏昌都察雅仁达和青海玉树贝沟石刻佛经的年代为公元9世纪初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期。这些佛教石刻的出现应是吐蕃王室推行佛教政治的产物,反映了吐蕃时期汉藏佛教间的密切互动与深度交融。

[关键词] 青藏高原东部;古藏文刻经;吐蕃时期;汉藏佛教

[中图分类号] K877.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22)04-0016-10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西藏昌都、青海玉树等地,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这些摩崖造像同时共存的还有古藏文题记,既包含有重要的历史信息,也有佛教刻经,已经有不少学者对这些题记进行收录研究,但对于其中的佛经部分不但有遗漏,并且研究不够充分。基于此,本文对这些古藏文佛教刻经进行专门整理,并探讨其所反映的吐蕃时期的佛教面貌。

---

<sup>①</sup> 本文系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研究成果。

## 一、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古藏文刻经

### (一) 西藏昌都察雅仁达石刻《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在西藏昌都市察雅县香堆镇仁加村仁达崖壁，发现了高浮雕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造像，造像的下方和右侧共刻有3组古藏文题记，第一组位于造像下方，4行，是讲修习正法之功德；第二组位于第一组下方，10行；第三组位于造像右侧上方，18行。其中第一组和第三组与《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有关，第二组则言明了造像时间、缘由、工匠、目的等，系雕刻于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期的猴年，即804年。<sup>①</sup>早在1988年，恰白·次旦平措就用藏文发表了第一组和第二组的题记录文，<sup>②</sup>郑堆、丹增把这篇论文又译成汉文发表。<sup>③</sup>同年对这一录文进行公布、翻译的还有马林，<sup>④</sup>此后不断有学者对这两组题记进行收录和研究。但是关于第三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古藏文题记则未见有人抄录、公布和翻译，仅在《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一书有一张黑白照片公布。<sup>⑤</sup>第三组的18行古藏文题记为简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约有48句，<sup>⑥</sup>若按每颂4句，则计12颂，每句7字。目前没有找到与之相同或相似的本。但其中的句子可以在全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中找到意义接近的句子，如其中的“ལུས་ངག་ཡིད་གྱིས་ཕྱག་འཚལ་ལོ”对应于“ལུས་ངང་ངག་ཡིད་ངང་བས་ཕྱག་བཞུངོ”，“དམ་ཚིས་འཁོར་ལོ་བསྐྱར་བར་བསྐྱལ་”对应于“འཁོར་ལོ་ལྷ་ན་མེད་པ་བསྐྱར་བར་བསྐྱལ་”，等等。可以看出，尽管内容简短，但均在全本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句子，因此推测该石刻本是为了适应崖面有限的空间而精心选取的一个本子，其母本应源自吐蕃时期流行的藏文译本全本，但十分精简，堪称是《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精简石刻本。

### (二) 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石刻《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在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西侧约130米处的一块崖壁上，阴线刻有36行古藏文题记，内容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其中第1—8行为普贤行愿陀罗尼，第9—36行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多位学者都对这一处题记进行过收录，<sup>⑦</sup>最新的整理校勘是四川大学考古队的现场识读、抄录和翻译。<sup>⑧</sup>这部石刻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是一部完整的版本，共有60颂，每句9字，有对应的汉、藏译本存在。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张建林等著：《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96—204页。

② 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藏文）1988年第1期。

③ 恰白·次旦平措撰文，郑堆、丹增译：《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④ 马林：《仁达摩崖刻石考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⑤ 张建林等著：《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第271页，图版132。

⑥ 由于每行的开头和结尾处看不清楚，因此这个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

⑦ 高瑞编著：《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藏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68—176页；恰嘎·旦正编著：《藏文碑文研究》（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107页；巴桑旺堆编著：《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8—119页。

⑧ 张延清、张长虹：《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摩崖石刻及线刻佛塔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20辑）2019年第1期，第82—94页。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亦译为《普贤菩萨行愿赞》，在吐蕃时期的译经目录《丹噶目录》(No. 470)和《旁塘目录》(No. 442)中均有收录，均记作97颂，<sup>①</sup>表明该经在吐蕃时期已经译出。该经还见于《大方广佛华严经》最后一品，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华严部，末尾注明由印度堪布 Jina-mitra、Surendrabodhi 和益西德翻译。<sup>②</sup>这几位都是吐蕃时期有名的译师，益西德据称是吐蕃时期翻译佛经最多的人。此外，在《甘珠尔》陀罗尼集中收录有单篇的偈颂经文。<sup>③</sup>在《丹珠尔》杂部最后汇集的祈愿、吉祥类中也有收集。<sup>④</sup>《甘珠尔》和《丹珠尔》所收的3个版本内容几乎完全相同，都为62颂，每句9字。在敦煌藏文文献中也发现不少《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及注疏写本，有学者统计共52件。<sup>⑤</sup>敦煌藏文写本一般为60颂，每句9字，如法藏敦煌写本 P. T. 45、P. T. 116 和英藏敦煌写本 ITJ 25，均为完整的藏文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均为60颂，每颂4句，每句9字。<sup>⑥</sup>藏文大藏经所收与敦煌写本中的内容十分接近，只有个别用字不同或语句顺序不一致，且最后多出2颂。有学者认为初译本只有60颂，多出的偈颂是印度论师和吐蕃译师添加的。《丹噶目录》和《旁塘目录》记作97颂，似是将后缀的其他经文也算入了其中。<sup>⑦</sup>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汉译本也有多种，收录于《大正藏》中，也见于敦煌汉文文献。《大正藏》所收的汉译本有唐代不空译《普贤菩萨行愿赞》，计有62颂，每颂4句，每句7字，偈颂后面还有八大菩萨赞和普贤行愿陀罗尼。<sup>⑧</sup>62颂的《普贤菩萨行愿赞》也见于唐代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四十卷之《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sup>⑨</sup>《大正藏》还收录有两部敦煌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No. 2907 和 No. 2908，为英藏敦煌本 S. 2361 和 S. 2384，均为60颂，每颂4句，每句7字。<sup>⑩</sup>敦煌文献中的汉文《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目前据统计有28件，<sup>⑪</sup>其中不乏保存完整者，如国家图书馆藏 BD3355 (2)、BD6056 (1)、BD7347<sup>⑫</sup>和英藏 S. 275<sup>⑬</sup>等，一般为60颂，每句7字。其中 P. 3568 卷首题“大蕃国沙门无分别奉诏译”，<sup>⑭</sup>表明该汉译本是吐蕃高僧无分别所译。

玉树贝沟的石刻古藏文《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共60颂，每颂4句，每句9字，其内容与敦煌写本几乎完全一致，仅有个别用字、用词不同，一句中字词顺序不同和个别语句顺序不同。如与 ITJ 25 相比较，第5偈第一句，贝沟石刻本为“མེ་ཉོག་དམ་པ་ཕྱིང་བ་མཚོག་རྣམ་དང་།”，ITJ 25 为“མེ་ཉོག་དམ་པ་ལའ་ཕྱིང་བ་”

① Marcelle Lalou, “Les textes bouddhiques au temps du roi Khri-srong lde bcen.” *Journal Asiatique*, CCXLI, 3, 1953, p. 330. 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3页。徐丽华：《藏文〈旁唐目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

② 《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第38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790—797页。

③ 《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第98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921—928页。

④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第116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621—1628页。

⑤ 该统计数字参见索南：《敦煌藏文文献 P. T. 149 号〈普贤行愿王经〉序言解读》，《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第63页注①。

⑥ 金雅声、郭恩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8—283页；《法藏敦煌藏文文献》③，2007年，第229—231页；金雅声、赵德安、沙木主编：《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6—196页。

⑦ 索南：《英藏敦煌藏文文献〈普贤行愿王经〉及相关问题研究》，《西藏研究》2013年第6期，第60页。

⑧ 《大正藏》第10卷，第880—881页。

⑨ 同上，第847—848页。

⑩ 《大正藏》第85卷，第1452—1455页。

⑪ 刘毅超编：《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下)，北京：学苑出版社，2021年，第674页。

⑫ 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46册，第70—71页；第81册，第259—262页；第96册，第252—253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⑬ 方广钊、[英]吴芳思主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2—355页。

⑭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3页。

དམ་པ་དང་།”，两句分别用了不同的词：མཚོག་རྣམས་和དམ་པ་，但两者意思相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第25偈第2句，贝沟石刻本为“བདག་གིས་ཉག་ཏུ་བྱུང་བ་མངོན་སྲིད་བཟླ།”，ITJ 25为“མངོན་སྲིད་ཉག་ཏུ་བདག་གིས་བྱུང་བར་བཟླ།”，这两句仅是词的顺序不同。再如第58、59偈，这两偈的8句，按ITJ 25中第1—8句的顺序，在贝沟石刻本中的顺序则为5、6、1、2、3、4、7、8，也就是说第59偈的前两句被前置到了第58偈的前两句。这些细微的差异不影响贝沟石刻本的完整性以及其与敦煌藏文写本的一致性。藏文大藏经中所收的版本与敦煌写本几乎一致，只是多出了两偈，其内容与汉译本也可以大致对应。汉译本尽管存在多个不同的译本，但可以看出各译本之间明显的相似性。如《大正藏》No. 2907所收敦煌本S. 2361开头第一偈为“尽诸十方世界尊，善游三世人师子；我身口意具清净，是故今当遍稽首”。大多数敦煌写本与此译本相同。《大正藏》No. 2908所收敦煌本S. 2384则为“应在十方刹土中，游于三世人师子；彼等诸佛我无遗，以净身口意稽首”。不空译本为“所有十方世界中，一切三世人师子；我今礼彼尽无余，皆以清净身口意”。般若译本为“所有十方世界中，一切三世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礼尽无余”。这4句在藏文译本则比较一致地呈现为“ཅི་ཞིང་སུ་དག་ཕྱོགས་བརྒྱའི་འཛིག་རྟེན་ན། །སུ་གསུམ་གཤེགས་པ་བྱིའི་མེད་གེ་ཀུན། །བདག་གྱིས་མ་ལུས་དེ་དག་ཐམས་ཆད་ལ། །ལུས་དང་དག་ཡིད་དང་བས་ཕྱག་བཟློ།””。因此可以推断，贝沟石刻本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已经流行，目前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写本中能够找到多件与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者，并且当时有多种对应的汉译本流行。

### （三）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石刻《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

距上述石刻《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约百米距离处，为贝沟大日如来佛堂，高浮雕有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造像，其旁边的崖壁上，阴线刻有两段、23行古藏文题记，第一段计有18行，第二段有5行。其中第二段的题记被复制再刻于一块石板上，嵌于佛殿内的一面墙壁上，即有名的“狗年题记”（806年），学界早有公布，多有研究。第一段题记的内容是对大日如来及众眷属的赞颂，近年的考古调查简报已有公布。<sup>①</sup>这是一部石刻的经文《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与紧邻的9尊浮雕造像是一体的，可以说是该处造像的文本依据。在这部石刻本的《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中，第一部分是是对大日如来及其所居佛刹和莲花、狮子、菩提树的赞颂；第二部分是是对八大菩萨的赞颂，八大菩萨的出场顺序依次为：观音菩萨、弥勒菩萨、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文殊菩萨、除盖障菩萨、地藏菩萨。各偈颂长短不一，最长的是对大日如来的赞颂，多达19句，最短的是对狮子的赞颂，仅有3句；对各菩萨的赞颂也是4—9句不等，其中对普贤菩萨的赞颂最长，达9句。各偈颂每句均为9字。

在吐蕃时期的译经目录《旁塘目录》（No. 420）和《丹噶目录》（No. 437）中均收录有一部《圣薄伽梵大日如来及眷属八菩萨赞及明咒二卷》，这部经布顿大师亦有收录，并注明译者为却季协饶（法智）。<sup>②</sup>《旁塘目录》（No. 674）中在赤松德赞所撰目录下面还有一部《圣大日如来、释迦牟尼及八菩

① 张长虹、张延清：《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20辑）2019年第1期，第26—37页。

② 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第31页；徐丽华：《藏文〈旁唐目录〉研究》，第133页。《丹噶目录》中的名称略有不同，但显然是同一部经，见Marcelle Lalou，“Les Textes Bouddhiques au Temps Du Roi Khri-sroñ-lde-bcan.” *Journal Asiatique*, CCXLI, 3, 1953, p. 329。布顿大师著，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14页。

萨赞》<sup>①</sup>但在《丹噶目录》中未见收录,布顿大师有收录<sup>②</sup>。说明该经也在吐蕃时期已经译出。在敦煌古藏文写本中,也发现有《毗如遮那及眷属赞》,如法藏 P. T. 7AV、P. T. 108,<sup>③</sup>英藏 ITJ 67,<sup>④</sup>这3个版中 P. T. 108 首全尾残,P. T. 7AV 首残尾全,ITJ 67 仅有1叶,但从其内容看,三者出自同一译本,内容相同,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赞颂长短一致,每颂均为8句,每句7字。该赞颂的内容和长短同贝沟石刻本不一样,但八位菩萨的出场顺序是一致的。

与贝沟石刻古藏文《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完全一致的汉译本目前还没有见到,但《大正藏》中收录有一部唐代不空译的《八大菩萨曼荼罗经》<sup>⑤</sup>是八大菩萨曼荼罗的供养观行法,给出了八大菩萨的名号、座次和身色、印契、执物、坐姿等图像学特征,其中八位菩萨的名号和出场顺序与贝沟石刻本一致,以往学者们在研究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的图像组合时常常引用此经。该经后半部分为“八大菩萨赞”,与不空译本《普贤菩萨行愿赞》后面所附的“八大菩萨赞”完全一致。

#### (四) 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无量寿宗要经》

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石刻是一处大型的集阴线刻佛传故事、古藏文题记为一体的佛教考古遗存,在各组石刻场景的中央位置,阴线刻有《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无量寿宗要经》,分别编号C组和B组题记。以往学者对这两部经也有收录,最早最完整的是高瑞(གཞུང་གོང་དོན་མཚོག་ཚོ་བཟན)在《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年第4期公布的青海玉树贝纳沟、勒巴沟发现的佛教摩崖石刻,其中就包括这两处佛经石刻题记,后来又收入其著作《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中。<sup>⑥</sup>此后巴桑旺堆、恰嘎·旦正等先生也均有收录。<sup>⑦</sup>不过迄今录文公布最完整并提供了可靠汉译文的是青海、四川联合考古队于2017年发表的调查简报。<sup>⑧</sup>

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无量寿宗要经》刻于B组佛诞图的右侧下方,共15行。第1—2行为题名;第3—8行为经咒,共16句;第9—15行为持诵该经咒的功德。《无量寿宗要经》是吐蕃时期最为通行的一部经,在敦煌藏文写卷中,该经数量最多。据最新统计,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数量为2281件,<sup>⑨</sup>并且该经是由王室赞助,抄写于9世纪20—40年代。<sup>⑩</sup>在敦煌汉文写卷中,该经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是隋唐时期流传最广的六部经卷之一,总计有977卷。<sup>⑪</sup>这部经因为数量多、文本全、分布分散,吸引了全世界的学者对之进行研究,青海民族大学桑吉东知对此有

① 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第47页;徐丽华:《藏文〈旁唐目录〉研究》,第146页。

② 布顿大师著,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第436页。

③ 金雅声、郭恩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①,第44—45页;《法藏敦煌藏文文献》③,第184页。

④ 金雅声、赵德安、沙木主编:《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95页。

⑤ 《大正藏》第20册, No. 1167, 第675—676页。

⑥ 高瑞编著:《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藏文),第176—179页。

⑦ 巴桑旺堆编著:《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藏文),第122—125页;恰嘎·旦正编著:《藏文碑文研究》(藏文),第113—118页。

⑧ 张长虹、张延清等:《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6辑)2017年第1期。

⑨ 夏吾措、桑吉东知:《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分类与流变关系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58页。

⑩ Brandon Dotson, “Misspelling ‘Buddha’: The officially commissioned Tibetan *Aparimitāyur-nāma Mahāyāna-sūtras* from Dunhuang and the study of Old Tibetan orthograph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9, 1, 2016, pp. 129–151.

⑪ 黄明信、东主才让:《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第61—62页。

很好的研究综述,<sup>①</sup> 兹不赘述。

《丹噶目录》和《旁塘目录》中均未发现该经,但《大正藏》目录 No. 936《大乘无量寿经》<sup>②</sup> 处注明“唐法成译”。王尧先生也提出“《大正藏》936号,法成根据藏文译成汉文本。原为敦煌写本”。<sup>③</sup> 法成在沙州的活动年代约为833—859年。<sup>④</sup> 藏文大藏经中收录有两部完整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题名为“འཕགས་པ་ཚོ་དང་ཡེ་ཤེས་དཔག་ཏུ་མེད་པ་ཞེས་བྱ་བ་ཞེས་པ་ཚེན་པོའི་མདོ།” (原德格版编号 No. 674、675),<sup>⑤</sup> 不同于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本的题名“ཚོ་དཔག་ཏུ་མེད་པའི་མདོ་ཞེས།”,但其内容同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写本类同。目前学界将敦煌文献中的藏文写本《无量寿宗要经》分为甲本和乙本,如《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24、125、126册中收录的藏文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每一部均标注了甲本或乙本,咒文较长的为甲本,短的则为乙本;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有些也标注了甲本或乙本。黄明信统计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收227个藏文写卷中,甲本145卷,乙本82卷。<sup>⑥</sup> 近年,夏吾措和桑吉东知在研究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时,按照经文的差异和咒语长短,将之分为甲乙丙丁4种。<sup>⑦</sup> 敦煌发现的大量汉文写本《无量寿宗要经》也被分为甲本和乙本,左丽萍统计出汉文敦煌写本《无量寿宗要经》甲本1200件,乙本6件,<sup>⑧</sup> 绝大多数为甲本。《大正藏》所收No. 936《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即为敦煌本甲本。日本学者上山大峻曾经将不同的汉藏写本进行了简单比较。<sup>⑨</sup> 笔者也撰文对汉、藏大藏经版本,敦煌写本和本文讨论的石刻本《无量寿宗要经》进行了对勘。<sup>⑩</sup>

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本《无量寿宗要经》同西藏昌都察雅仁达石刻《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一样,也因崖面空间所限,刊刻内容十分精简。《无量寿宗要经》全本的内容可分为5部分:一、缘起;二、若干千万佛一时同声说此经(汉藏文各本中具体数目有所不同);三、咒语(每当说完该经的一种功德,即出现一段同样的咒语,反复出现多次,各本出现的次数不完全相同,有24次、30次等,各本中咒文的长短也有所不同);四、分说书写持诵、布施供养此经的功德(功德一般有18种或16种,各本亦有不同);五、偈语(共6段,各本中也是长短不一)。<sup>⑪</sup> 该石刻本仅保留了经文的核心部分,即第三、四部分,略去了第一、二、五部分。其中功德部分也是大大缩略,只有简短一句,也没达到16种。咒语部分相对较为完整,因为该咒语本不算长,最长的版本为18句,最短的有13句,此处为16句。介于两者之间。吾娜桑嘎石刻本尽管是精简本,但其咒语和功德大部分可

① 桑吉东知:《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青藏高原论坛》2019年第2期。

② 《大正藏》No. 936在目录和卷首均题名为《大乘无量寿经》,卷末则题《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因为汉文大藏经中另有一部经名叫《无量寿经》,系曹魏康僧铠所译,为示区别,故这部经一般称为《无量寿宗要经》。

③ 王尧:《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第103页。

④ 王尧:《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文物》1980年第7期,第50—52页。

⑤ 《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第91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776—792,793—807页。两者的内容几乎一样,只是No. 674的咒文比No. 675多了4句。

⑥ 黄明信、东主才让:《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第67页。

⑦ 夏吾措、桑吉东知:《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分类与流变关系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⑧ 左丽萍:《敦煌〈大乘无量寿经〉写本考暨俗字汇辑》,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7—41页。这6件乙本中,国家图书馆藏BD6348号下有3份写本,作者统计为3件,这3件内容完全一致,如果作为一件,实际上乙本只有4件。

⑨ 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2012年,第437—455页。

⑩ 张长虹:《青海玉树勒巴沟发现的古藏文刻经〈无量寿宗要经〉》,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64, Tuiilet, 2022。

⑪ 黄明信、东主才让前揭文中将该经内容分为6个部分,笔者将其第三、四部分合并,因其均是分说该经的功德。再者,本文所讨论的石刻本中,咒语出现在功德的前面,因此这里笔者将咒语部分置于功德部分的前面。

以在各种完整的藏、汉译本的《无量寿宗要经》中找到,其母本应是源自某个《无量寿宗要经》藏文译本的全本。

#### (五) 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该经刻于前述《无量寿宗要经》的旁边,位于整个石刻点的正中央位置,分布在一块高大平整的崖面上,共有28行,<sup>①</sup>最下方还有一句六字真言,是一部完整的石刻本《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下文简称《般若心经》)。

《丹噶目录》(No. 14)<sup>②</sup>和《旁塘目录》(No. 15)<sup>③</sup>中均收录有该经,均记作28颂。表明该经在吐蕃时期已经译出,现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的般若部(No. 21)和十万怛特罗部(No. 531)。<sup>④</sup>根据该经译跋,译者为印度堪布离垢友(འཇིག་ལ་མི་ལྷ། Vimalamitra)和译师比丘仁钦德(རིན་ཆེན་ལྷེ།),由主校译师格洛(དགེ་ལོ།)和南喀(ནམ་མཁའ།)等校订。在敦煌藏文文献中,《般若心经》写本的数量也不少,仅《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就收录有70多件。《般若心经》根据内容可分为大本和小本,也称为广本和略本,大本具足序分、流通分和正宗分,小本只有正宗分。其中藏文大藏经的版本和法藏P. T. 449、451、457、494、495等为大本,其他法藏敦煌藏文写本则为小本,小本的数量远远多于大本。

《般若心经》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大乘般若类佛教经典,在中国非常流行,先后被译成汉文达21次之多。<sup>⑤</sup>玄奘的260字《般若心经》更是家喻户晓。各种汉译本中,鸠摩罗什和玄奘的译本为小本;此后法月、般若共利言、法成、智慧轮的译本均三分具足,称作大本。<sup>⑥</sup>如法藏P. 4882《般若心经》,卷首题名“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sup>⑦</sup>《般若心经》由于流行程度广、各语种文本丰富,研究比较充分。荷兰莱顿大学斯尔克曾对14种不同版本或抄本的藏文《般若心经》进行了仔细的对勘研究;<sup>⑧</sup>沈卫荣曾将藏文大藏经收录的两种藏译本与法成和施护的汉译本进行对勘;<sup>⑨</sup>才让对《般若心经》的藏译本进行梳理,将大本又分为大本甲类和大本乙类,并对P. T. 449进行了专门研究。<sup>⑩</sup>褚俊杰在王尧对勘藏、汉《般若心经》<sup>⑪</sup>的基础上,又对藏文大藏经本和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中的语词进行了研究。<sup>⑫</sup>笔者在考古调查简报中也对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的石刻本与几种汉

① 该经最新、最完整的录文和译文见张长虹、张延清等:《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6辑)2017年第1期,第120—124页。

② Marcelle Lalou, “Les textes bouddhiques au temps du roi Khri-sron-lde-bcan.” *Journal Asiatique*, CCXLI, 3, 1953, p. 319.

③ 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第4页。徐丽华:《藏文〈旁塘目录〉研究》,第107页。

④ 《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第34卷,第402—405页;第88卷,第297—300页。

⑤ 方广钊编纂:《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2—3页。

⑥ 这几种汉译本见《大正藏》No. 251—255。此外,方广钊编纂的《般若心经译注集成》收录有18种汉译本,除本文提到的这几种译本为大本外,还有几种异本(敦煌遗书)和西藏传本亦均为大本。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

⑧ Jonathan A. Silk, *The Heart Sūtra in Tibetan,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Two Recensions Contained in the Kanjur*,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1994.

⑨ 沈卫荣:《汉、藏译〈心经〉对勘》,载谈锡永等著:《心经内义与究竟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233—277页。

⑩ 才让:《法藏敦煌藏文本P. T. 449号〈般若心经〉研究》,《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2期。该文后收入才让:《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25—244页。

⑪ 王尧:《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西藏研究》1989年第3期。

⑫ 褚俊杰:《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同藏文大藏经本、梵文本和汉文本的语词比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53页。

藏译本进行了简要对勘，认为其与法藏 P. T. 494 较为接近，译成汉文后，与法成译本比较接近，<sup>①</sup> 是一部藏译本大本。

## 二、几点观察

通过对上面在西藏昌都、青海玉树等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石刻古藏文佛经的整理，我们发现它们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一）这批刻经均反映了这一时期汉藏佛教的密切互动与深度交融

目前发现的这几部刻经均既有藏译本，也有汉译本，并且《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全本、《无量寿宗要经》全本和《般若心经》大本均有内容相同的藏、汉译本可相互参照，存在藏汉互译的情况。法藏 P. 3568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根据卷首题名是由吐蕃沙门无分别奉诏译，无分别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42—约 800）时期的一名高僧，<sup>②</sup>《布顿佛教史》中收录有多部他从梵文、汉文译成藏文的经典，如《佛说回向轮经》就是由汉文译出，<sup>③</sup> 这些表明他兼通藏、汉、梵等多种语言文字，不仅将汉文的经典译成藏文，也将藏文的经典译成汉文。法藏 P. 4882 《般若心经》根据卷首题名是由吐蕃高僧法成译成汉文，《大正藏》目录 No. 936 号《无量寿宗要经》也注明“唐法成译”。法成也是吐蕃时期的著名高僧，活跃于 9 世纪上半叶，在河西地区长期从事佛教活动，吐蕃经卷里前后出现他的署名约 20 处。<sup>④</sup> 王尧先生对法成从藏文译成汉文、从汉文译成藏文的经目进行了梳理。<sup>⑤</sup> 吐蕃时期活跃着一批像无分别、法成这样的高僧，精通多种语言，将梵文、汉文、于阗文等不同文字的佛经翻译成藏文，同时也将藏文佛经译成汉文，推动了汉藏佛教的深度交流与融合。除了这些文化精英，当时还有非常多的地位低下的写经生，兼通汉藏双语，不仅有汉族，还有藏族和其他民族。如法藏 P. T. 470—477 《般若心经》藏文写卷绝大部分是一个叫（张）进达（译音）的汉人书写的。<sup>⑥</sup> 抄写了数十卷《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生名录中，张略没藏是一个少数民族。<sup>⑦</sup> 敦煌吐蕃经卷显然是多民族协作的产物。西藏昌都察雅仁达石刻除藏文题记外，还有一组汉文题记，表明汉族工匠也参与了佛经和造像的刻造。<sup>⑧</sup>

### （二）这几处刻经是吐蕃王室践行佛教政治的产物

在西藏昌都察雅仁达和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的刻经处同时刻有纪年题记，记载了刻经造

① 张长虹、张延清等：《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 16 辑）2017 年第 1 期，第 120—124 页。

② 陆离：《敦煌文书 P. 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译者吐蕃沙门无分别考》，《敦煌研究》2008 年第 2 期。

③ 布顿大师著，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第 238 页。

④ 黄文焕：《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世界宗教研究》第二集，1980 年，第 58 页。李禅娜对法成的手迹进行了整理研究，见 Li Channa, “Toward A Typology of Chöddrup’s (Tib. Chos Grub, Chin. Facheng 法成) Cursive Handwriting: A Pala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uddhistRoad Paper* 1. 2, 2021.

⑤ 王尧：《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文物》1980 年第 7 期。

⑥ 褚俊杰：《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同藏文大藏经本、梵文本和汉文本的语词比较》，第 30 页。

⑦ 转引自黄明信、东主才让：《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中国藏学》1994 年第 2 期，第 62 页。

⑧ 张建林等著：《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第 99—100 页。

像的时间、目的和功能。两处石刻的年代均为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期,前者为804年,后者为806年,年代接近;造像题材相同,均为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刻经内容也相似,分别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全本和精简本。仁达石刻第二组题记提到“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封授比丘为佛法和议政大臣之衔,赐金子以下告身。王妃钦氏列莫赞等众多王室成员和臣民入解脱之道,命宰相比丘……以及内臣论韦·赤松热朵赞等开始着手与唐议和之事。故,堪布巴廓·益西央·比丘……为赞普之功德,众生之福泽,雕刻佛像与经文……”<sup>①</sup>。贝沟大日如来佛堂石刻题记记载“狗年,浮雕众佛像及缮写如上所有经文之祝愿等,为今上赞普赤德松赞之世君臣、施主及一切众生之故也。此乃比丘大译师益西央主持……众生之任何人或目睹、或触摸、或礼敬、或听闻、或忆念,其福德及智慧之力,均回向赞普父子及一切众生,登于无上菩提也。此愿!”<sup>②</sup>从题记可知,这两处造像和刻经均由比丘大译师巴廓·益西央主持,<sup>③</sup>是为了赞普之功德,众生之福泽;其建造背景是为了“开始着手与唐议和”。关于这一点,多名学者已经有了精彩论述,<sup>④</sup>不再赘述。两处题记中多次提到“封授比丘为佛法和议政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大译师益西央”等,可知此时僧人在吐蕃地方政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力,青藏高原东部这批在益西央主持下雕刻的佛经和佛像很可能就是得到了吐蕃王室甚至是赞普本人的授意与大力支持。吐蕃自赞普赤松德赞时起尊崇佛教,以桑耶寺为倡佛根据地,在吐蕃各地广建塔寺、制作佛像、供养僧人、资助翻译和抄经,以佛僧为宰相,兴佛证盟、建立僧官体制等,符合“佛教政治”九大特色中的大部分。<sup>⑤</sup>其子赤德松赞在他的基础上将佛教政治更推进一步,继续崇佛抑苯,以僧人为相,以佛法理政,<sup>⑥</sup>在青藏高原东部刻经造像,玉树贝沟等地大日如来穿上吐蕃赞普的服装,将佛与赞普等同,等等。这些都是践行佛教政治的产物,从中也可看出唐朝对其的影响。<sup>⑦</sup>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汉藏佛教传统中都是一部与王室信仰密切有关的经典。<sup>⑧</sup>法藏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是无分别奉赞普之命译出的。不空和般若的汉译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是

① 该处题记有多名学者进行过翻译,这里采用的是巴桑旺堆最新的翻译,见巴桑旺堆:《关于仁达吐蕃摩崖石刻的几个问题——仁达吐蕃摩崖石刻实地考察心得》,《中国藏学》2017年第2期,第54页。

② 该题记也有多名学者翻译过,这里采用调查简报中的译文。见张长虹、张延清:《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20辑)2019年第1期,第36—37页。

③ 巴廓·益西央的名字还见于甘青交界的扁都口石刻,见张延清:《甘青交界扁都口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20辑)2019年第1期。关于益西央,已有不少学者作过研究,近年的相关研究有霍巍:《论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与吐蕃高僧益西央》,《西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张延清:《吐蕃高僧益西央考辨》,《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巴桑旺堆:《关于仁达吐蕃摩崖石刻的几个问题——仁达吐蕃摩崖石刻实地考察心得》,《中国藏学》2017年第2期,等等。关于青藏高原东部吐蕃佛教石刻题记中的巴廓·益西央和敦煌文献P.T.996中的吐蕃禅宗大师布·益西央是否为同一人,学者们的意见有分歧,笔者认为两人有着不同的姓,暂不能认定为同一人。

④ 霍巍:《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背景初探》,《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霍巍:《唐蕃会盟与吐蕃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董华锋:《唐蕃关系视野下的藏东大日如来八大菩萨造像》,《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

⑤ 林冠群:《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362—375页。

⑥ 陈庆英:《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生平简述》,载《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中国藏学出版社,第42—77页。

⑦ 更为详细的论述见张长虹、张延清:《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20辑)2019年第1期,第61—68页。

⑧ Sam van Schaik and Lewis Doney, “The Prayer, the Priest and the Tsenpo: An Early Buddhist Narrative from Dunhuang.”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 30, no. 1-2, 2007 (2009), pp. 184-186. Bart Dessein, “The Glow of the Vow of the Teacher Samantabhadra ‘Puxianpusa Xing Yuan Zan’ (T. 297) Samantabhadrācāryaprañidhānarāj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 56, no. 2/4, 2003, pp. 317-338.

奉皇帝之命翻译，不空本人也在唐代受到皇室重用。《无量寿宗要经》同样与王室和赞普有着密切关系，是为赞普积福而写。法藏 P. T. 999 记载：“作为天子赤祖德赞之功德，在沙州写造了汉、藏文的经典《无量寿经》，作为对臣民的广泛的教法大布施……作为王后赞蒙彭母子之光护（微松）宫殿之功德……依据宫廷的指令及信函……作为教法大布施的资具，从龙兴寺的经籍仓库中，取出汉文《无量寿经》135 卷，藏文 480 卷，总计 615 卷，散发给众人……”<sup>①</sup> 这里的《无量寿经》即指《无量寿宗要经》。从这份文书可以看出，《无量寿宗要经》因为是为赞普积福，因此抄经所需费用可能都由王室资助，管理上也更为严格，抄经质量也胜于其他经文。青藏高原东部出现的这几部刻经都与王室、赞普有关，应该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是与吐蕃以佛教理政，王室和赞普亲自介入抄经、刻经、造像等活动密切相关的。

### （三）青藏高原东部的刻经内容和造像题材反映了与河西地区相似的佛教实践

昌都察雅仁达石刻和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石刻，不仅刻经内容相似，均有《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并且造像题材也一模一样，均为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玉树贝沟还有刻经《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为造像的文本依据。这些刻经和造像的出现表明《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与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是常被联系在一起的一种佛教实践。这在敦煌古藏文写本中也可找到佐证，如法藏 P. T. 7A 是多种经组合在一起的一个文本，显然是用于佛教的修习和实践，其中就有这两部经。

由不空于 756—774 年之间译出的《普贤菩萨行愿赞》，在普贤菩萨行愿赞的后面就是八大菩萨赞，然后又是普贤行愿陀罗尼，并且八大菩萨的名号和出场顺序与藏东刻经和造像中的一致。《普贤菩萨行愿赞》中的八大菩萨赞与不空翻译的《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内容是一样的。在敦煌石窟壁画和绘画中，也发现不少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题材，最有名的为榆林窟 25 窟，此外还有莫高窟第 14 窟、榆林窟 20 窟等，很可能是受到了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的影响。<sup>②</sup> 相似经典的出现、相同题材的图像出现，反映了两地之间相似的佛教实践。

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这批古藏文刻经均雕刻于 9 世纪初的吐蕃时期后期，为我们提供了除大藏经版本和敦煌写本之外另一种比较可靠的版本，他们同造像一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不应被忽视。

[ 本文责任编辑 央宗 ]

[ 作者简介 ] 张长虹，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研究员（成都 610065）。

<sup>①</sup> 陈庆英：《从敦煌藏文 P. T. 999 号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载《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第 24—41 页。

<sup>②</sup> 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众多，仅举数例，如陈粟裕：《榆林 25 窟—佛八菩萨图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 年第 5 期；刘永增：《敦煌石窟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解说》（上、下），《敦煌研究》2009 年第 4、5 期；Yury Khokhlov, “Uncovering Amoghavajra’s legacy in the Hexi Corridor and Tibet.”《藏学学刊》（第 21 辑）2019 年第 2 期。

## **A Look at the Multiethnic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Newly Unearthed Tubo Tomb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HUO We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ew tombs of the Tubo period have been unearthed by archaeologist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with different grades and shapes, reflecting very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a batch of tombs, as well as the tomb system and customs, of the Tubo period newly unearthed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From these tombs, we can see the intertwining and integrating relation between the local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cultural facto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and Hexi regions, which reflects several historical fragments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living here in the 7—9 centurie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burial system and customs during the Tubo period.

**Keywords:** Qinghai-Tibet Plateau; Archaeology; Tubo tombs; Ethnic contact communication and fusion; Plateau Silk Road

## **Buddhist Sutras Carved on Stone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Buddhism during the Tubo Period**

**ZHANG Chang-hong**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several Buddhist rock carvings of images combined with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dated to the Tubo period have been found in Chamdo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in Yushu, Qinghai Province. In this paper, we sorted out these rock carved sutras and discovered that they belong to the *Kun du* [ or : tu ] *bzang po spyodpavismon lam gyirgyal po*, the *rNam par snangmdzadkhor dang bcas pa la bstod pa*, the *Tshedpag du myedpavimdosde* and the *vPhags pa bcomldanvdas ma shesrabgyipharol du phyinpavisnying po*. These sutras were already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during the Tubo period and similar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can be found in both Tibetan and Han Buddhist canons and old Dunhuang documents. According to the inscription, the date of the Buddhist rock carvings in Chamdo and Yushu can be placed in the reign of *btsan po Khrildesrongbtsan*, that is, sometim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th century. Upon closer inspection of

these rock carvings, we argue that they were the produ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ddhist politics by the Tibetan royal court and reflect the close interaction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Buddhism during the Tubo period.

**Keywords:**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Tubo period; Han and Tibetan Buddhism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Gilded Silver Crown Excavated from Tomb No.1 in Wulanquangou, Qinghai**

**LI Shuai, ZHU Ming**

**Abstract:** The gilded silver crown excavated from tomb No. 1 in Wulanquangou reveals a type of crown that existed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is kind of crown style should be based on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mixed with the crystallization of multiple cultures including the Central Plains, the northern grassland and Central Asia. The concept of gold and silver crown may come from the tradition of northern grassland culture, which has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e later Khitan crown. The tradition of square crowns and the practice of hanging beads in front of crowns sh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 Central Plains. The images of dragons, phoenixes and lions on the crown should have special meanings. The above three animals have different orientations on the crown, which may reflect the crown owner's differential understanding to the meaning of those animals, their background culture and concepts. The gemstones on the crown are equally diverse, reflec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lateau Silk Road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From the unearthed state and combined with the literature, the crown may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to dress" in the funeral ceremony for the soul of the tomb owner to use in the post-mortem world.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rown, we can not on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ncient crown system of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but also see the contacts and exchang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Keywords:** Gilded silver crown; Tomb No. 1 in Wulanquangou; Crown style; Qinghai-Tibet Plateau; Cultural integration